

## 政策上区分公民和永久居民受访专家：要团结民心应培养归属感

陈劲禾

联合早报, 2015年10月26日

过去几年，政府逐渐收紧移民政策，推出政策时，在公民与永久居民之间做出更明显的区分。

就这一问题，受访的专家与学者告诉《新汇点》，虽然金钱利益可让国人产生被重视的感觉，但不足以构成认同感。他们认为，团结民心的关键在于人与人之间是否能给予彼此信心，在危机时刻患难与共。

上个月底，教育部宣布，从明年1月起，永久居民学生的学费上调，新加坡公民学生的学费维持不变，并表示此举是为了“进一步按公民权来区分学费”。

今年7月，本地综合诊所的收费起价，永久居民的收费增幅比公民的大。公共医院的收费过去一年多陆续起价，也呈现同样的趋势。

此外，从今年开始，宝宝出生后，父母可获得更高的婴儿花红。婴儿花红计划仅适用于公民，而不适用于永久居民。

过去几年，政府逐渐收紧移民政策，同时，推出政策时，在公民与永久居民之间做出更明显的区分。

例如，2013年推出的组屋转售调控措施，限制外籍夫妇只有在获取永久居民权满三年后，才可购买转售组屋。

税务局网站上的资料也显示，从2013年开始，若夫妻俩都是永久居民，购买转售组屋时，须缴交5%的额外买方印花税。

曾担任官委议员的Strategic Moves咨询公司总裁维斯瓦（Viswa Sadasivan）受访时说：“在上一届的2011年大选之前，政府就已经承受很大的压力去区分两者，也花了很长的时间做出区别。

“我认为，政府是想让公民感觉良好，觉得他们可享有特权。我不认为它是想让永久居民感到不快，或是觉得现在被忽略了。”

新加坡国立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陈恩赐说：“这些举动有其象征意义，用来加强国家重视公民、公民有其特权的想法。”受访居民：为孩子的未来而入籍来自马来西亚霹靂州的庄丽晶（31岁，行政人员）大学毕业后来新工作已有八年，随着宝宝的诞生，她决定入籍，也为孩子申请公民权，以方便日后升学和发展。

她受访时说，刚结婚时并没有考虑得太长远，也没有去思考入籍这件事，在购买组屋方面也觉得经济能力负担得起，直到有了孩子才有较长远的打算。

进大学之前，她曾经来新打工六个月，当时就已考虑毕业后要到这里发展。她说：“新加坡给人的印象是安全、环境舒服。来新加坡发展一直都是我的第一选择。”

马来西亚治安不好，一直以来都造成人民生活上的困扰。来自檳城的洪巧桔（32岁，税务咨询员）受访时说，新加坡社会安全，居住在这里不会有危机感。

当初过来新加坡，是因为本地会计楼的人事部到她在马来西亚就读的大学招聘，之前也有学长通过这个途径到新加坡工作。主修会计的她，觉得这是个良好的就业机会，于是与一群应征成功的同学来到这里发展。

她说，初到新加坡工作，经常需要加班到很晚，深夜一个人搭德士回家，并不会让她感到害怕。“在马来西亚，别说是晚上，就连白天都要结伴搭德士。”她同样因为考虑到孩子的教育与未来的发展而在近年内入籍。

王予寒（32岁，执行人员）认为，公民与永久居民之间其实没什么差别。已婚但没有孩子的他，未曾认真考虑是否要入籍。

“从柔佛州过来这里发展是很自然的事。这里离家很近，过来发展，百利无一害。”

高中毕业后，他到台湾念大学，之后来新工作，在本地已生活了七年。

谈及对未来家庭规划作何感想，他说：“不同人喜欢不同的生活方式。这里的日子是过得去，但感觉这里许多小孩冷漠、功利主义、不尊重长辈。如果有人说不让孩子在这里生长，也可以理解。” 分析师：差异扩大可能出现反效果受访的专家与学者表示，政府更明显地区分公民与永久居民之间的差异，或许可以暂时安抚公民的情绪，但在某种程度上，可能会出现反效果。

维斯瓦说：“人们会申请公民权的真正原因，是因为他们觉得对这个国家有归属感。扩大利益上的差别，不一定会使人们想要申请公民权。

“这些利益上的差别都与金钱有关。我们可能会发出错误的信号，促使人们因为金钱而入籍，不经意地营造唯利是图的风气。”

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政策研究所资深研究员梁振雄博士说：“我不认为物质利益长期下来会有帮助。短期内，它可能可以说服一些永久居民入籍，并且使新加坡人相信政府在制定政策时，以他们为首要考量，但长期下来，不能只靠金钱上的利益。”

“重要的是，要用什么样的叙事手法（narrative），才能让公民与非公民拥有共同的观点？我认为，这与一个人看待外国人的态度有关，要看你相信他们是来同甘共苦的，还是只是过客。”

维斯瓦认为，如果有永久居民因为利益上的差别扩大而感觉受伤害，那是因为他们确实对国家有感情。

“假设一个永久居民爱这个国家，这些举动就会让他觉得不受欢迎。更糟的是，他可能会觉得，算了，收拾包袱走人。如果一个人没有投入感情，又负担得起，这些利益对他一点意义也没有。”

他指出，富豪或享有外派人员津贴的白领阶级可享有一流的生活起居与医药保健服务，任何利益上的区分对他们而言都无关痛痒。

“因此，他们会继续留在这里。他们会觉得这是个方便逗留又安全的地方，但他们不会想要成为公民。”

梁振雄说，目前社会上根深蒂固的想法是，公民与外国人之间是个零和博弈，即一方获益时，另一方就必须付出代价。“事情不一定要是这个样子。这是个根深蒂固的想法，需要很长的时间来解开。”

他说，有研究显示，2005年到2009年新移民涌入的这段期间，政府的政策经常在暗示新加坡人要营造包容的环境来迎接外国人。

“2009年、2010年引起社会的强烈反应后，就比较平衡。你可以观察到，政策传达的信息与部长的宣布，都在呼吁双方要和平共处。”

维斯瓦说：“执政党在2011年大选受到打击后，几乎像是必须证明给不高兴的新加坡人看，证明一切都井井有条，证明他们听到新加坡人的心声，放缓（移民进来的速度）。”

他表示，原则上，公民与永久居民确实要有区分，但实施政策的速度与幅度如何拿捏才是关键。

“我们最终要的是社会的融合。如果对立关系加深，就无法达到融合的效果。我认为政策需要更好的管控，循序渐进，不应该有这么多计划接踵而来。”身份认同感的无形元素

虽然金钱或物质上的利益，可让国人产生被重视的感觉，是个重要的元素，但专家与学者表示，这不足以构成认同感。

那构成新加坡人身份认同感的，包含哪些无形元素？

新加坡东南亚研究院高级研究员庄庆山博士早前在本报的言论版曾写道：“新加坡人身份认同感的特征，是对外部竞争的日夜操心；作为一个民族国家还是全球化都市之间的矛盾声音。这加深了新加坡人对国家生存的焦虑，灌输他们一种明确的现实主义。这焦虑感和现实主义塑造了新加坡人的身份认同感。”

梁振雄指出，2003年，流行性传染病沙斯（SARS）爆发时，本地与外籍护士并肩作战，共同抵抗病毒。“那种时刻，人们明白国籍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为共同目标而奋斗的精神。这就回到人与人的关系，是否能共患难。本地人与外国人是否能再度共患难，是值得关注的课题。”

问及是否只有危机出现才能团结民心，梁振雄解释说：“不需要像沙斯这样的危机来团结双方。我的意思是，双方可以加深对彼此的了解与欣赏，同甘共苦。”

陈恩赐表示，新加坡还未经历任何重大又起决定性作用的事件，足以让它从一个安居乐业的场所，擢升为拥有不可动摇精神的国家。

他在回复本报电邮询问时引述其文章写道的：“家长式治理的贡献是，动员新成立国家里的多元化人口，把他们团结起来，不论是身为一个经济体，还是身为一个国家。但家长式治理的局限在于国家建设变成比较像是政府的项目，而不是人民的项目，由政府作为合伙人与促进者。

他说，新加坡逐渐成为一个成熟的社会，新加坡人将拥有掌控自己命运的巨大潜能，而家长式治理也将演变成政府与人民的合作关系。

“若国家建设逐渐成为人民与政府的共同项目，所产生的爱国精神将超越对美食、地方、家人与朋友的喜爱，达到关爱全国社群的境界，以致人民能够患难与共。”

虽然金钱或物质上的利益，可让国人产生被重视的感觉，但专家与学者认为，这不足以构成认同感，重要的是培养国人为共同目标而奋斗的精神。

前任官委议员兼Strategic Moves咨询公司总裁维斯瓦：原则上，公民与永久居民确实要有区分，但实施政策的速度与幅度如何拿捏才是关键。

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政策研究所资深研究员梁振雄博士：短期内，金钱利益的差距可能可以说服一些永久居民入籍，并且使新加坡人相信政府在制定政策时，他们是首要考量，但长期下来，不能只靠金钱利益。

新加坡国立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陈恩赐：随着新加坡逐渐成为一个成熟的社会，新加坡人将拥有巨大的潜能，去掌控自己的命运，而家长式治理也将演变成政府与人民的合作关系。